

怀故人

为母则刚

孙为刚

“女本柔弱,为母则刚”是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梁启超在其惊世之作《新民说》中提炼出的一个观点。意思是说女人原本是比较柔弱的,而一旦成为母亲之后,则会因为母爱的天性和本能,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刚强和勇敢。

我的母亲冯吉美就是一个“为母则刚”的范例。

我的左侧股骨头位置,有一个1元钱硬币大小的疤痕,这是当年得了一种叫做“贴骨流”的病留下的。

“贴骨流”也称“附骨疽”,是一种毒邪深袭、附骨而生的化脓性疾病,即使在今天,也是一种比较难治且致残率很高的骨科顽症。不幸的是,我在四五岁的时候患此顽症。我姑娘在世的时候,经常叫着我的小名说:“小×呀,你小时候得了‘贴骨流’,差一点儿成了‘瘸子’。”

关于治疗“贴骨流”的过程我已经没有多少印象,是长大后从姑娘断断续续的述说中依稀想起了一些当年的情景。

那是个大热天,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母亲抱着(或背着)我去医院。治疗过程的痛苦难以言状,每一次手术或换药都是一次痛不欲生的劫难。医生用手术刀切开患处,放出脓血,然后用刀片刮去骨头上的病毒,再将带药的纱布塞

进伤口。我拼尽全力地挣扎,声嘶力竭地嚎叫。母亲和护士则用尽全身力气摁住我拼命挣扎的身体。每一次治疗,母亲都是满头大汗,满脸泪水。几天后的换药同样是一场酷刑。换完药,身材不高的母亲背着已到她腰间的我,一步一步地走回家。如此反复地刮骨、换药、塞纱布、包纱布,我的“贴骨流”终于治好了,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,只是留下一个圆圆的、浅浅的伤疤。后来,我读了《三国演义》,知道了“刮骨疗毒”一词。我想,我治疗“贴骨流”的经历大概就是刮骨疗毒吧?!

令我疑惑不解的是,我长大后,母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及当年她带我“刮骨疗毒”的艰辛和付出,但我知道,那份担心、焦虑和煎熬,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心灵深处,不愿再次触及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10岁那年的秋天,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令我至今难忘。

也不用再说了,是死是活都在一块儿了!”

更为严峻的情况还不止这些,母亲当时因为照顾父亲而失去了工作。

父亲患病后不久,由于病情加重,生活不能自理。由于当时的干部政策尚不完善,加之正值“文革”,整个社会管理混乱,父亲的护理要求无人理会,母亲只好承担起照顾父亲生活的重担。为此,单位让她辞职,母亲坚决不辞职,单位的领导就说:“你不辞职就发给你百分之四十的生活费!”

父亲去世后,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没有了,母亲百分之四十的生活费只有不到20块钱,加上我们兄妹4人的遗属生活补贴,全家5口人加起来的生活费只有40块钱。在那个年代,这些钱只能保证有饭吃,

验检查,医生告诉我们,无法确诊就是肺结核,就按肺结核治疗吧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知道了一个医学名词:诊断性治疗。于是,住院数周后,母亲回家继续吃一种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——异烟肼。这种药一个疗程就是半年,且有不少副作用。母亲坚持吃了半年的异烟肼,再去复查,肺部的磨玻璃影及其他检查结果依然如故。肺结核治疗也告一段落,不了了之。

85岁之后,母亲身上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不断表现出来,我们四处寻医问药效果甚微。母亲的认知障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,对于子女的姓名、称呼开始错乱。晚年的母亲,对重孙辈喜爱有加,就连最喜爱的重孙辈,也常常是张冠李戴,每每叫错。有时看到他们在面前嬉闹,母亲无奈地说道:“我这是怎么了,知道自己家里的孩子,谁是谁,都分不清了,都分不清了。”

我们兄妹有时陪她说说话,说着说着,她突然戛然而止,看样子想说,但说不出来,只好无奈地说道:“我不会说了,不会说了。”那种困惑、无奈、无助的神情,让人为之叹息。

进入暮年之后,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,几乎每年都要住一两次甚至两

那时,母亲在离县城30多华里外的一个农村供销社工作。那天晚上,只有1岁的弟弟,发了几天高烧后突然身体抽搐,眼珠上翻,情况十分危急。村医说,赶紧上县医院吧,再晚了孩子怕保不住。当时的农村,没有救护车,也没有机动车,父亲在几十公里外的人民公社工作,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外面,狂风携着暴雨,伸手不见五指,闪电划过夜空,炸雷隆隆而过,两个妹妹吓得蜷缩在炕角嘤嘤而泣。

去,还是不去?母亲斩钉截铁地说:“下刀子也得去!”母亲请来供销社年轻力壮的李宝喜叔叔,让他在自行车上绑一个偏筐,上面搭上块雨布,把弟弟放在里面。母亲穿上雨衣,带上手电筒,一头扎进了狂风暴雨中。那一夜的艰辛,我无从知晓。几天后,经确诊患脑膜炎的弟弟因抢救及时,转危为安,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,后来还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。

饿不死人,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。刚强的母亲没有向生活屈服,没有向命运低头,她勇敢地挑起了这个五口之家的重担。

父亲去世后,不用再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了,为恢复失去的工作,母亲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。写材料、上访、申诉,当时的掌权者走马灯似的,一会儿工宣队,一会儿军管会,一会儿又是复出的老干部,母亲上访、要求恢复工作的节奏不乱,步伐不停。遭遇的冷脸、白眼乃至呵斥不计其数,母亲据理力争,针锋相对,绝不退让。

两年后,母亲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,上级落实了政策,母亲重新恢复了工作,恢复了工资待遇。重返工作岗位,久违的笑容又回到母亲的脸上。

三次医院。母亲既不悲哀,也不慌张,有几次病危后仍坦然面对。一次,她因肺炎住院,病情十分危急,经抢救后转危为安。一天早上,我去病房接班,透过门缝,传出一阵熟悉的歌声:“木(没)有共产党,就木(没)有新中国……”推开门一看,是母亲安详地坐在病床上,神情专注地唱着这首她最熟悉的歌。

2021年农历六月初八,是母亲92岁的生日,我们全家20余口给母亲庆生。晚上,母亲突然发起烧来,我们赶紧把母亲送到医院。

母亲这一生,不知多少次进出医院,但是这一次,母亲再没有走出医院的大门。在与病魔抗争了55天之后,母亲最后一次睁开眼睛,深情地看了看围在她周围的子女,然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

这位15岁参加民兵,16岁入党,18岁脱产参加革命工作,38岁之后独自撑起一个家的坚强女性,历尽挫折磨难、刚强一生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“忠心耿耿干革命,光荣在党七十五年忠诚可鉴;母爱殷殷为家庭,含辛茹苦七十余载恩泽后生。”在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,这副挽联表达了子孙后代对母亲的崇敬之情。

往事如昨

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

盖少艳

为照看十几亩地,父亲决定不去打工了。他给自行车绑上几个袋子,里面装着秤杆子,走街串巷吆喝着收破烂。那崎岖不平的山路,留下了父亲忙碌的身影。

有一次,父亲收购了一辆拖拉机,赚了不少钱,母亲买回一盆猪骨头。猪肉的香味飘满屋子,我们姐妹三个洗干净了手,骨头一出锅就开抢了。母亲笑咪咪地叮嘱:慢点啃,别烫着。

街上收废品的人越来越多,父亲又改行卖爆米花。爆米花装进大编织袋里,因为体积大、重量轻,父亲便在自行车大梁上拴一块很重的铁块坠着。我经常趁父亲不注意靠近编织袋,偷爆米花吃。

我们交学费的时候,母亲总拉开抽屉,拿出大小面额不一的钞票。母亲数了又数,确定数对了,才递到我们手里,叮嘱:“一定装好了,千万别丢了,这是你爸赚的辛苦钱。”

年底,父亲骑自行车去莱西贩鞭炮,夜里很晚才回来。父亲低声和母亲说:“往回走的途中被安检的拦住了,没有贩卖鞭炮的证明一律扣押。”等到把鞭炮带回家,已过最佳销售时间,母亲让父亲宽心,说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母亲给我们添置了新衣服过年,自己却一件也没准备。

开春,父亲去冷库进了一批冻猪头卖。每到星期六、星期天,我就骑自行车跟在父亲后面吆喝:“卖猪头肉喽!”父亲负责称重量,我负责算账,那些大娘大婶都夸我账算得又快又准。父亲又联系海阳一家工厂卖洗衣膏。父亲把自行车后座改造成又宽又长,一次能载10箱洗衣膏,一箱能赚5块钱,父亲一天跑两趟,卖20箱就是100块钱,收入很可观。有一次突遇大雨,他把自行车赶到农户的屋檐下,自己则躲在了鸡棚里。雨后父亲回家,身上全是鸡屎。

父亲靠做小买卖供我们念完了书,我们相继工作了。腊月我和大嫚带着年货坐车回家,我和大嫚都晕车。父母商议后,不顾我们的反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:把家搬到我们工作的城市。父亲为筹钱装修,去浴池学搓澡,中午就是一碗白开水、一点干粮……

好多年后的一个午后,我和父亲母亲坐在炕上。那时我也做了母亲,6岁的儿子在旁边。我忽然发现母亲脖子上有一道疤,就问:“这疤是怎么一回事?”母亲淡淡地说:“有一年,你和大嫚要回去上班,我就去市里做了甲状腺手术。”母亲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:“做完手术,血把衣领湿透了。你爸白天收破烂很累,晚上来趴床边睡了还打呼噜。我做完手术嗓子很干,想喝水却喊不出声音来……”

母亲平淡地讲述着,我羞愧不已,感觉亏欠父母太多太多了!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父母的恩情,我们一辈子都无法报答。